

孙子兵法新注



前 言

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，我们遵照毛主席“古为今用”的指示，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为指导，对《孙子兵法》做了新注。目的是和广大工农兵一起，研究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同儒法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关系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，批判孔孟之道，揭露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实质，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，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服务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。

(一)

《孙子兵法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，不但在军事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在哲学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中国历代军事家都很推崇它，自宋代以后被列入《武经七书》之首，在世界上也获得很高评价。

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孙武，春秋末期齐国人，是

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，法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。孙武的生卒年代不详，大体和孔丘同时。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孙武从齐国到了吴国，以兵法十三篇求见吴王阖闾，受到重用，当了将军。从公元前五一二年到公元前四八二年，先后帮助吴王阖闾和吴王夫差“西破强楚”，“南服越人”，“北威齐晋”，争霸中原。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竹简来看，《孙子兵法》确为孙武所作，产生于春秋末期。当然，《孙子兵法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，经过后人编纂、整理，在内容和文字上有一些改动。

春秋末期，为什么能产生《孙子兵法》这部军事著作呢？

马克思教导我们：“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，相反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。”（《“政治经济学批判”序言》）《孙子兵法》的产生，是和当时的社会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，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，是人们在战争实践中反复认识客观规律的产物。春秋战国，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。春秋末期则是这一变革中斗争极其激烈、奴隶制处于崩溃的时期。孙武所出生的齐国，是一个封建制因素发展较早较快的国家。公元前六八五年齐桓公执政后，任用法家人物管仲为相，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实行了一系

列改革，封建主义因素逐步得到产生和发展，致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（《史记·管仲列传》），成为春秋末期的第一个霸主。齐桓公和管仲死后，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争夺统治权，展开了长期的斗争。斗争的结果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，不断取得胜利，逐步夺取了齐国的统治权。齐国的这些情况，对孙武的政治、军事、哲学思想的形成，都有重大影响。孙武后来所在的吴国，为了摆脱楚国的控制和压迫，从吴王寿梦到吴王僚的四十多年间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。公元前五一五年吴王阖间执政后，对内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，对外执行“西破强楚，北威齐晋，南服越人”（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）的战略方针。孙武在吴国任将期间参加了战争实践，对其军事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除齐、吴两国外，当时其他各国也都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随之激化了。一方面，奴隶起义此伏彼起，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形势，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腐朽没落的奴隶制；另一方面，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发展壮大，他们废井田、作丘赋、越“周礼”、铸刑鼎，并进而“弑其君”、夺取国家政权。在这股历史潮流冲击下，奴隶主贵族惶惶不可终日，奴隶制国家一个接一个地灭亡。据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所说：在春秋期间，被杀掉的奴隶主国君有三十六人，被灭亡的奴隶制国家有五十二个，到处奔跑不能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头子，多得无法计算。但是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并不甘心失败，总是疯狂地企图复辟。因此，围绕着夺权和反夺权、反复辟和复辟这个根本问题，展开了激烈的全面的阶级大搏斗。这一斗争反映在政治思想领域里，就是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。儒家站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立场上，提出一条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政治路线，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；法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，提出一条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，主张把历史推向前进。毛主席说：“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”。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再也不能照旧前进，于是爆发了战争，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。”（《论持久战》）在春秋二百几十年里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导致了许许多多的战争，除奴隶起义外，仅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就达四百八十三次之多。在激烈的斗争中，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摧毁没落的奴隶制，确立和巩固封建制，迫切需要能够为本阶级服务的军事理论，而大量的战争实践，为认识战争规律提供了源泉。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，孙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，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，写成了流传至今的《孙子兵法》。

(二)

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对于战争、战略、战术、治军等许多方面，都有较为重要的论述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规律，体现了“以法治军”的思想，是对儒家“以礼治军”的批判。

一、孙武的战争观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要求

春秋末期，在“礼崩乐坏”的形势下，孔丘出于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的政治目的，一方面鼓吹“去兵去食”，极力反对新兴地主阶级所进行的统一战争，另一方面却叫嚷“征伐自天子出”，主张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战争。

孙武的战争观，则与此相反。

首先，他十分重视军队和战争。《孙子兵法》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指出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在《火攻篇》又指出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”，“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。”正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时刻，孙武明确提出军队和战争的重要性，要求人们重视战争，研究战争，对战争持慎重态度。这既是对孔丘“去兵去食”

反动观点的否定，也区别于一切没落的阶级穷兵黩武的反动思想，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正确地使用暴力，达到夺取政权、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。

其次，他赞助和支持新兴地主阶级所进行的统一战争。主张举“霸王之兵”，“威加于敌”，“廓地分利”，拔取敌人的城寨，毁灭敌人的国家，这一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。春秋二百多年间的统一战争，从根本上打破了“征伐自天子出”这个反动的奴隶制的军事制度；消灭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奴隶制诸侯国，加速了国家统一的进程，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壮大。这就是统一战争的进步性所在。列宁曾经指出：“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，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、暴行、灾难和痛苦，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，也就是说，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，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……”（《社会主义与战争》）。春秋时期的统一战争，正如列宁所说的是“有利于人类的发展”的战争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步孔孟之徒的后尘，大骂春秋时期的统一战争是“互相颠覆”、“互相残杀”，这是对历史的诬蔑和歪曲，妄图以此抹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。

此外，孙武还把实行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政治，看成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。他把“道”摆在决

定战争胜负的“五事”的首位，强调“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”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只有新兴地主阶级才能在某种相对程度上做到“令民与上同意”，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。由此可见，孙武所讲的“道”显然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，这就更加说明他的军事思想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。

二、孙武的建军思想是“以法治军”

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，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建军路线。孔丘在政治上搞“克己复礼”，在军事上则鼓吹“以礼治军”，胡说什么“军旅有礼，故武功成也”，“治军……非礼威严不行”，“勇而无礼则乱”。就是要把腐朽没落的“周礼”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，向军队灌输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政治思想，使军队成为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的工具。

与此相反，孙武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，主张“以法治军”，把新兴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，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。他主张治军要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”，就是说既要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来教育士兵，又要用严格的纪律来保证本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。因而他非常重视厚赏和严罚，提倡打起仗来要激怒部队，奖励士兵，“施无法之赏”；对泄露机密和偷听军情的人要处以死刑，“悬无政之令”。

孙武提出要爱抚士兵，善养降卒。在《地形篇》中说，要“视卒如婴儿”、“如爱子”；在《作战篇》中说，对被俘虏的敌军降卒要“善而养之”。在古代能这样提出问题，是可贵的。虽然孙武“爱兵”和“善俘”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他们，使其为新兴地主阶级效劳，但是，这比较奴隶主阶级把士兵和俘虏当作奴隶，只知道残酷虐待、任意杀戮的野蛮行为，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孙武选将的标准很严格，体现了“任人唯贤”的法家人用路线。他要求将领具备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五个条件；要善于了解和掌握情况，做到“知彼知己”、“知天知地”；要有高度的责任心，做到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于主”。

上述这些，从治军的内容到方法，都同儒家“以礼治军”针锋相对，是为建设一支新兴地主阶级的军队服务的。

历史经验证明，用什么样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军队，这是关系到军队的性质和作用，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大肆宣扬“克己复礼”，向军队灌输孔孟之道，鼓吹“诱以官、禄、德”，妄图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腐蚀瓦解我军，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，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，必须彻底批判。

三、孙武的战略战术是主动灵活的

孙武的战略思想，主张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打有准备的速胜机动进攻战。他在总体上主张战略进攻，特别强调深入敌国作战，对战略防御讲的不多，这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积极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要求。对于战略进攻问题，孙武强调要做好战争准备，要速战速胜，要打机动的野战。这一战略思想，既是主动的，也是灵活的。

关于战争准备的问题，孙武十分重视。在《计篇》中，他要求把战争双方决定胜负的各项因素做全面比较，胜利条件不充分不能开战。在《作战篇》中，他要求必须把战争的一切用具和用费筹备妥善。在《谋攻篇》中，他要求必须全面了解各种情况，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制订好作战方案。在《形篇》中，他还进一步提出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的原则，做到“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”，反映了他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思想。

关于战略速胜问题，孙武极力主张速决，不主张持久。他认为，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。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，力量耗尽，财政困难，列国诸侯就会乘机侵犯，那时即使有智谋高明的人也无法防止后患了。结论是：“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孙武的这一思想，在春秋末期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对于促

进新兴地主阶级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是有重要意义的。但是，孙武不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持久战是有片面性的。他没有认识到速胜或持久，主要是由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。从战争规律上看，特别是正义而弱小的一方，要战胜强大而非正义的一方，一般说来是非经过持久斗争不可的。

关于战略机动问题，孙武强调野战，反对攻城。认为野战有利于机动，而攻城则旷日持久，师劳力竭，甚至会造成“杀士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”的后果。但他不是绝对地反对攻城。他认为“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，也就是说必要的攻城是允许的。恩格斯说：“装备、编成、编制、战术和战略，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。这里起变革作用的，……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份的改变”（《反杜林论》）。在春秋末期，由于武器的简单，没有攻城的强大手段，袭击和埋伏是最有利的作战方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孙武主张野战，反对一般的攻城，这是对的。

在战术上，孙武的思想更为主动灵活，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和脍炙人口的名言。其主要的有以下几点：

致人而不致于人。致人，就是要调动敌人；致于人，就是被敌人调动。怎样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呢？孙武主张“示形”以造势，用“诡道”欺骗敌人。要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

近”，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，“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”，用各种办法麻痹敌人；还要善于“夺气”、“夺心”，打击敌军的士气，扰乱敌将的决心，从而造成敌人的混乱和被动，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。

出奇制胜。孙武说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”，“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”，“奇正相生”，“不可胜穷”。要求战争指挥者，必须根据不同情况，把各种作战方式灵活巧妙地结合起来，神出鬼没，变化多端，造成有利的态势，夺取战场上的胜利。

避实击虚。孙武认为，克敌制胜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实击虚；搞好避实击虚，战胜敌人就象用石头打鸡蛋那样容易。他在《虚实篇》中非常形象地说：“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”这一思想不但是战役、战术上取得胜利的保证，而且是实现战略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、以小胜大的根本办法。

灵活多变。从作战方式、兵力使用、战斗指挥到各种情况的处理，孙武都主张要灵活多变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。他认为，根据总的战略利益和具体情况，将领有权临机决断，可以“途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”。这就是说，处理任何情况，都要因时、因事、因地制宜，只要有利于战争全局就可以。对“君命有所不受”的问题，

他作了反复的论述，认为将领带兵在外，必须以认真负责精神，按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办事，以保证战争的胜利。

以上就是孙武的主要战略战术思想。它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基础之上，充满了主动灵活的精神，是生气勃勃的、革命的、进步的，表现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艺术的发展水平，在现代条件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大肆鼓吹的所谓“六个战术原则”，主张打“一点两面”的击溃战；兜售死打硬拚的“三猛战术”和大打莽撞仗的“三种情况，三种打法”，搞消极保守、坐失战机的“四快一慢”；规定不顾实际情况的“三三制”、“四组一队”。这些被林彪称为不变的“铁则”，反映了他军事上的冒险主义、投降主义和教条主义。完全是唯心论、形而上学的大杂烩，充满了机械的教条和公式，是主观臆造的、反动的、倒退的，是反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。我们在吸取《孙子兵法》有益的经验的同时，必须彻底批判林彪的“六个战术”，把他的一整套黑货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。

(三)

历史上一切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，最终都不可避

免地要在世界观的领域里尖锐地反映出来。儒家的反动军事思想，是以唯心论、形而上学为基础的。孔丘的忠实信徒项羽，直到兵败自杀前还连声哀叹“天亡我也”，顽固地坚持天命观。与儒家相反，孙武的军事思想，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。

孙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，首先表现在对天的看法上。他同其他先驱法家人物一样，不相信天有意志，而把天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。在《计篇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”在《九地篇》和《用间篇》中说，要“禁祥去疑”（反对迷信谣言），“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，……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”，并认为天是可以被认识的，也是可以被利用的，提出指导战争必须要“知天知地”，鲜明地表现了战斗而无神论的特色。

孙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，还表现在对战争胜负的看法上。《孙子兵法》第一篇（《计篇》）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“五事”：“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”并对这“五事”进行了具体分析。道，是指政治条件；天和地，是指自然条件；将和法，是指军事条件，即将帅的才能和军队的建设情况。在其它篇中还讲到了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以及战争和外交的关系，认为“兴师十万”要“日费千金”，“军无

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委积则亡”；要“知诸侯之谋”，善于“豫交”、“合交”和“伐交”。他把战争放在各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去考察，充分体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战争观。

孙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，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指导战争的思想路线上。他认为，正确指导战争必须通过对比分析、“相敌”、“用间”等方法，做到“知彼知己”，“因敌制胜”。在《计篇》他提出，要从七个方面分析对比敌我双方的条件，从而制定作战方针。在《谋攻篇》提出，要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确定进攻敌人的具体方案；在了解敌我兵力对比的情况下确定具体的战术原则——“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……”。在《虚实篇》他强调“因敌制胜”，在“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”的基础上，“则可千里而会战”。在《用间篇》他强调：“凡军之所欲击，城之所欲攻，人之所欲杀，必先知其守将、左右、谒者、门者、舍人之姓名，令吾间必索知之。”总之，从制定作战方针到确定一切具体行动，都必须以充分了解客观情况为基础，这是一条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，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。

除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外，在《孙子兵法》中还反映了丰富的、朴素的辩证法思想。孙武注意从事物的矛盾、发展、变化中观察问题，孙武看到战争中的许多

现象都是互相矛盾的，提出一系列矛盾对立统一的范畴，如敌我、主客、众寡、强弱、攻守、进退、奇正、虚实、动静、勇怯、治乱、胜败、迂直、利害、生死、存亡，等等，并将这些范畴应用于战略战术的研究中。同时，孙武还看到了矛盾的发展变化。他说：“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复生，四时是也。……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……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……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……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……”，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”这种发展观虽然带有某些形而上学循环论的缺点，但是，在两千多年前，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，研究战争，在当时是进步的。此外孙武还看到了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及其转化的条件。他说：“乱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治乱，数也；勇怯，势也；强弱，形也。”这就是说，矛盾对立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，乱和治的转化是由组织的好坏决定的，怯和勇的转化是由战场上的态势决定的，弱和强的转化是由敌我双方的军形（主要指力量对比）决定的。

他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，提出了“诱敌”、“扰敌”、“疲敌”、“饿敌”、“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”、“出奇制胜”、“避实击虚”等各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办法和要求。对于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，孙武比较注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。根据不同的敌人，他要求，

要“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”；根据不同的情况，他要求“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”；根据不同的作战地区，他要求“圯地则行，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”，等等。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上，认为“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”，要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。就是说，能不能被敌人战胜是由自己的条件决定的，敌人能不能被我战胜，也是由敌人本身的条件决定的。所以，要先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缺点，造成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，并等待时机抓住敌人的弱点、缺点和错误后再去战胜它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认为当敌人没有暴露缺点和错误时胜利是不可强求的，“胜可知，而不可为”。但是，他又要求将领必须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用各种办法诱使敌人犯错误，暴露弱点，从而战胜敌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认为胜利是可以造成的，“胜可为也”。在人和武器、人和地形的关系上，他看到了火攻和水攻是古代战争中威力巨大的手段，要人们很好地加以利用，但他仍把火和水的作用看成是“佐攻”，也就是说是人攻的辅助；他看到了地形在战争中的重要性，要求人们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地形而用兵，同时又指出地形仅仅是“兵之助也”，战争中造成的各种失败不是地形的原因，而是将领的过错。当然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上孙武也有其片面性。例如：把特殊情况下才能做到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作为普遍性